

谈巴尔扎克小说 的艺术得失

李玉莲

在国外,巴尔扎克是个毁誉参半的作家;而在我国,巴尔扎克享受的更多的是溢美之词。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有一定的联系。多少年来,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极左思潮的泛滥,几乎成了文学评论的羁绊,社会学的判断几乎代替了审美判断。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在领袖人物作出某种界定后,人们很难再作超越性的评价。因为恩格斯曾说过“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的多的现实主义大师。”^①於是左拉就一度被打入冷宫,而巴尔扎克的不足亦几乎成了禁区。其实,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评价常常以艺术的社会效应为核心、为标准。这种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固然不失为艺术评价的一个角度,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因为一个作家不管如何超拔,他还是无法超越其生活的现实与历史的。历史的凝重感,是文学价值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个角度并不是唯一的角度,领袖的评价也往往不是终极的真理。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所以,对领袖评价过的作家进行新的探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在灿若星河的外国作家中,巴尔扎克毫无疑问地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以宏伟的艺术气魄,筑造了《人间喜剧》这座艺术大厦,用如椽巨笔对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关系作了力透纸背的描写。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九十多部作品相继问世,可谓才思如潮,汨汨而出。这些作品涉及了社会的各个层次:从国王、大臣、银行家、高利贷者、商人到农民、强盗、仆役、妓女;触摸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宫庭、法院、贵族沙龙、军队到上等公寓、贫民窟。更为重要的是,巴尔扎克深刻地把握了他所处的十九世纪上半期社会关系的本质。他的作品犹如一幅社会风俗画,形态毕肖地勾勒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在文字的缝隙中呈现出社会的总体流向。正是从这个角度,恩格斯给予了巴尔扎克最高的评价:“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社会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一八一五年以后又重新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是模范的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和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

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②不难看出，恩格斯主要是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做为审美出发点的。我们不能不说，就这一方面来说，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是中肯的。

巴尔扎克的艺术功力还表现为其庞大的结构体系，九十多部作品融为一个整体，他们以整体的形态反映着人间的喜剧。这九十多部作品，每一部都是一个子系统，而同时又属于《人间喜剧》这一母系统。在“分析研究”“风俗研究”“哲学研究”这一体系之下，“巴黎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私人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乡村生活场景”六个场景几乎涵盖了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作者又以重复出现的人物作为纽带，将其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社会生活的艺术参照系。真实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而巴尔扎克的这种整体真实恰恰部分地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当人们看到《高老头》里的伏脱冷在《交际花盛衰记》里当上了保安队长，后来又当上了刑警处长，拉斯蒂涅在泯灭了天良之后而飞黄腾达之时，当看到鲍塞昂夫人的爱情几度被愚弄时，所产生的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真实的愤怒。

我们承认巴尔扎克是一座丰碑。那些“刚刚读了巴尔扎克的一部小说（而且还有《古物陈列室》和《高老头》）便以十分傲慢和极大轻蔑的口气说它是一种平凡和庸俗的东西。”③的人是浅薄的。但是，承认巴尔扎克的伟大并不等于承认他的完美，“企图根据一种规律评判所有的文章，就象用一个模型铸造所有的心灵，接着一个计划改造所有的时代，是同样不合理的事情。”④

文学是人学。那么，人是什么？恩格斯说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也就是说人性很复杂，没有一个人简单到只有一种性格特征。那么，做为入学的文学，首先应该反映出人的性格的丰富性。用黑格尔的话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一个真正的人就的时具有许多神，许多神各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包罗在他的心里，全体奥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因此，人物性格也须现出这种丰富性。一个性格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就在于他一方面实现了整体性，同时就在这丰富性中它却仍是他本身，仍是一种完备的整体。如果人物性格没有现出这样的完满性和主体性，而只是抽象的任某一情欲去支配，它就不是什么性格，而是乖戾反常。”⑤黑格尔的话讲得十分透辟，一个文学形象只有在它具备了常人的种种优点和缺点，以独特的结构构成一个丰富而又独特的世界时，做为审美客体，它能够被审美主体所接受。而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做同恰恰还不够完美。

巴尔扎克认为“典型就是类的样本”，“热情就是整个人类”。基于这种观点，他的作品往往强化人的某一情欲，一方面力求写出“最鲜明的性格特征”，一方面凸现“热情”这一元素。从而，他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巴尔扎克式情欲的化身，比如于洛的淫欲，邦斯舅舅的贪吃、怪僻，贝姨的嫉妒，葛朗台的吝啬，高老头的父爱。过去，人们往往把这当做巴尔扎克的优点来赞美。其实不然，现实生活中的人绝不仅仅具有一种情欲，即便是某一种欲望可能一时占上风，它也不过是人类种种本能的外化。虽然有时可能反映了性格的某个侧面，但是绝不能代替性格。不错，强化人的某一情欲以突出社会对人的扭曲，这是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度的，但不一定就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巴尔扎克强烈地烘托了高老头的父爱，这种父爱的被糟蹋、被蹂躏、被扭曲，对社会的批判不谓不深。

刻，但由于作品只强调了“父爱”这一种“情欲”，而忽视了对他做为人的多面性的刻画，这一人物于是给人以单薄抽象之感。同样写吝啬、贪婪，莎士比亚的夏洛克就显得更混圆生动，在他的身上，有着偶然与反常：做为一个犹太商人，他贪婪、吝啬；做为一个受歧视的犹太人，他又有着强烈的民族尊严感。为了维护这种尊严，这个以贪婪吝啬做为主体性格的夏洛克竟然放弃了几倍于三千元钱而非要巴萨尼奥一磅肉。这一磅肉吐露了一个受轻视，被压抑的灵魂的呼声。一个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方位往往是多层次的。对父母来说是儿女，对弟妹来说是兄妹，对子女来说是父母，对社会来说是工人，教师等等。在不同的层次上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老葛朗台则显得有点单纯，金钱占有欲成了他生活的轴心。对女儿缺少起码的舐犊之情，对妻子没有应有的怜爱。兄弟死了，他却责怪侄子是个傻瓜，“把死人看得比钱还重”，乃至自己到了生命尽头的刹那，那颗被铜臭熏腐了的灵魂还在银钱中找安慰。人性在他身上几乎丧失殆尽。没有偶然构不成人生，而在葛朗台的身上连人性的偶然闪光也很难找见。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复杂的，再恶的人也有善的一面，再善的人也不可能找不到一瑕点疵，而巴尔扎克由于强调反映时代的本质真实，而忽略了另一种真实：人性的真实。这是造成许多人不爱读他的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把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的人物比作一座座巨雕，他们突兀、生动，给人栩栩如生的立体感。那么，巴尔扎克的人物则是一幅巨型的壁画，他们百态纷呈，但还是给人一种平面感。对巴尔扎克的人物作远距离观照，他们有的吝啬，有的嫉妒，有的好色，可说是各色人物一应俱全。但如作近距离审视，就会发现这些人物由于某一特征的强化，却未能显示出人的性格的无限丰富性。

做为入学的文学，不仅应该写出人的性格的丰富性，而且应该揭示人们潜意识层的隐密活动，写出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弗洛伊德把人们的意识分为三个层次，“伊德是一种混沌状态，一锅沸腾的激情，伊德完全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恶和道德。”“自我代表理智和审慎”“超我坚持行为的一定准则。”⑥三者交织在一起，人处在十分复杂的状态。“可怜的自我服侍三个严厉的主人，即外在世界，超我和伊德，每当自我尽力满足他们三位，或者最恰当地说，同时服从他们三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惋惜把自我人格化，并使自我成为一个分裂的人。”⑦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强调人性的复杂性无疑是正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是很复杂的，有时甚至很难用善恶、美丑来划分；做为文学形象，虽然不能单单说复杂的人物形象才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但是，复杂形象毕竟更接近生活中的常人，自然更具有审美价值。《安娜》、《红与黑》、《简爱》所以历久不衰，正在于他们再现了活生生的复杂的人。人们在安娜、于连、简爱，甚至德·瑞那夫人身上发现了自己（哪怕是某一方面，某一点），从而引起了心灵的震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总的来说，巴尔扎克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刻划还不够深刻。高老头爱女儿爱得如痴如狂，以致于可以为女儿去偷去抢去拉情夫。然而，他还是不断地被冷落，终至被遗弃。这对社会本质的揭露不谓不深刻，这命运不谓不悲惨。然而，这个人物与读者的共鸣度远不及安娜、于连。人们在品味之余难免要问：“世界上会有这样的父亲？！他的内心世界被简化为爱，一味的爱，为女儿荡尽了金钱然后又被女儿拒之于门外，对于一个从女儿很小的时候起就兼父母之爱于一身的人来说，那该是怎样的痛苦！然而，高老头似乎没有痛苦，女儿不让他进门，他就等在门外，就享受那

偷偷摸摸窥视女儿的“快乐”，在见到女儿这本应是杂幸福、痛苦、不安等种种情绪于一瞬的时刻，巴尔扎克却仅仅道出了高老头的开心快活，正象巴尔扎克所说，这种“盲目的感情，已经把他象狗一样的本能发展到出神入化。”然而，高老头毕竟不是狗，他该有人的种种情感！其实，人类的爱原本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物，没有哪一种诚挚的爱不夹杂着痛苦和哀伤。当然，作者不是一点未写高老头的内心矛盾（如果那样的话，巴尔扎克就不成其为巴尔扎克了），但是，这矛盾集中在死神来临的那一个时刻，尽管强烈，却也无法补足已经造成的缺憾了。

同是写情人间缱绻的爱恋，安娜的爱被写得叹为观止，做为一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的已婚女人，在遇到渥沦斯基后，安娜的整个生命燃烧了。在爱的本能驱使下，感情的浪潮吞没了安娜，她躁动，她欢欣，她狂喜有如饿汉得到了食物。然而，安娜同时是一个在封建伦理道德、宗教思想熏陶下长大的贵夫人，是阿辽沙的母亲，那来自心灵的压力，那负罪感，羞耻心把安娜又投向了痛苦的深渊，她所尝受到的是苦涩的幸福。当她一旦决定为了这幸福而抛弃过去曾经拥有过的一切而跟随渥沦斯基的时候，渥沦斯基便成了她的一切。她加倍爱他，唯恐失去他，于是想控制他，而控制的结果与其愿望相反，安娜失去了内心的平衡，她越来越神经质了。可以说，作者把握了安娜内在感情的微澜，将一个人种种复杂的心绪点点滴滴倾泻在笔端。而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里的埃斯黛，虽然经历了从妓女到恋人，又从恋人到妓女的曲折的人生变化，这种变化应该折射回内心，从而引起内心深处的几层波澜的。但是，从埃斯黛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几乎仅仅是圣洁而又近于愚昧的爱恋。做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妓女，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轻浮软弱的吕西安，这爱情将她身上妓女的痕迹涤荡的一丝无存。如果说，这变化来自爱情的神奇魔力是令人相信的，那么，当吕西安把她当做向上爬的垫脚石重又推回妓女生涯的深渊之时，她还爱的那么虔诚，那么平静，就让人感到有点不可理解了。本来，这个时刻是最富美学意蕴的时刻，一个人爱与恨的矛盾，种种复杂痛苦的心境，应该在这个时刻表现得最充分，而巴尔扎克却将它轻轻地带了过去。于是，一个本来可以富有葱茏诗意的形象，却显得苍白无力了。当然，我们无权指责作家用了此一种写法而未用彼一种，但是，我们可以说此一种写法是更具审美价值的，而彼一种稍逊。在人物描写方面，巴尔扎克运用了典型化的方法，他对共性的揭示是深刻的，他的人物个性很突出，但还不够丰厚。

造成巴尔扎克这些缺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要很重的一点源于他的典型化原则。他曾明确指出，“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但是，如果把他们弄得一模一样，则又会成为作家的毁灭性判决。因为他作品中的人物就不会是艺术虚构的产物了。”^⑧不难看出，他的典型观强调的是共性，这与西方文艺是理论中的类型观念，性格整一观念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而实际上，个性才是最富美学意蕴的。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巴尔扎克的人物描写。在他的“情欲”原则下，伏脱冷是一个例外。这个苦役犯强悍，粗犷，是恶的化身，而又无时不闪现出善的火花，在他的身上显露着灵魂的丑和力的美。这是一颗说不清的灵魂，他的身上透着巴尔扎克的才

气。

做为艺术家，巴尔扎克有着了不起的才力。同时，他还有着科学家的禀赋。科学家的禀赋使巴尔扎克的作品形成一个系统，同时也使之冗长而繁赘（因为他要解剖而不是要描写），除了他对笔下的人物“象解剖学家一样，先揭起一条筋肉，然后一根骨头，然后一条血管，然后一根神经，他察看过浑身的器官和官能，方才轮到脑筋和心脏。”

⑨此外，他的环境描写也不象司汤达似的简洁、含蓄、清晰或屠格涅夫式的富有诗情画意。“他先描写城市，然后描写街道和房屋，他解剖房屋的门面，石墙的窟窿，门窗的构造和木料，柱子的基座，苔藓的颜色，窗格上的铁锈，玻璃上的裂口。他解说房间的分布，壁炉的样式，壁衣的年岁、家具的种类和位置，然后过渡到衣服和用品。”⑩一般说来，当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人们往往是带着心灵的饥渴去展读的，迅速地展开情节，猛烈地攻入人物的灵魂，是抓住读者的最好办法。于是，巴尔扎克这种解剖式的做法便使他失去了一些读者的宠爱。

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但并不完美。我们应该尽可能公允地评价他。

注释

①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信》

②同上

③恩格斯1852年10月4日给马克思的信

④泰纳《巴尔扎克论》

⑤黑格尔《美学》302页

⑥弗洛伊德《无意识结构》

⑦同上

⑧巴尔扎克《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

⑨泰纳《巴尔扎克论》

⑩同上

（上接18页）

及其学者口中的“暴民统治”，自然指的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制度。奈斯比特正是为提防发生这种“暴民统治”，才用他的知识价值理论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因为，按照奈斯比特的知识价值理论的逻辑，在他所谓的“开始于1956和1957年”的“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不再是劳动创造价值，资本不再是剥削雇佣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就无需再反对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如此，则可防止发生“暴民统治”。这就是奈斯比特“知识价值理论”的奥秘中的奥秘。他为使短命者长存而杜撰的“新的知识价值理论”自然不能成立，被他所否定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仍巍然屹立。